

庄子

散文选集

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部分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部分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庄子

【散文选集】

冯钟芸 选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子散文选集/(战国)庄周著;冯钟芸编.—2版.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百花散文书系.古代散文丛书)
ISBN 7-5306-1785-0

I. 庄... II. ①庄...②冯... III. 古典散文—作品
集—中国—战国时代 IV. I2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328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875 插页 2 字数 122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2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19.80 元

编辑例言

一、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它和诗歌一样,同是中国古代文学最主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古代散文优良传统,以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特编辑这套“中国古代散文丛书”,作为“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

二、散文文体范围,代有嬗变,古今不同。本丛书所选,以抒情、记述体等文学性较强的散文为主。入选作家上起自先秦,下迄于清代。按不同作家分别成册。各书篇目排次,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以便读者了解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演变轨迹。

三、本丛书每书分两部分:一为论文,内容除简介作者生平、文学活动外,着重结合选入本书的作品,分析、评述其散文创作思想特别是艺术特色、散文创作发展历程及影响。一为散文,每篇均附加题解、注释。

四、论文部分力图与散文部分互补共济,以论文帮助

读者对所选散文提高到理性认识,又以所选散文来深化读者对论文的感性认识,两相印证,使本丛书除选注散文佳作供阅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兼具作家论乃至古代散文史的作用,既不同于一般散文选本,也有异于一般的古代散文史而自具独有的特色。

五、每书所选散文,除了作者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外,还照顾到作者不同时期、不同题材、风格的文学性散文,以便体现作者散文创作发展道路。

六、题解除解释文题中有关词语、专门名词等和说明写作时间、出处、版本等外,还对作品写作背景、思想价值、艺术特色以至艺术手法等,加以简明的评述。

七、注释以疏解难字、难词以及典故、职官、器物、人名、地名等为主。对其重要者、用法特殊者,并援引出处或例句,以便读者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

百花文艺出版社

庄子和他的散文

冯钟芸

庄周(约公元前362年—约前285年。据马叙伦、吕振羽、范文澜、闻一多考证,庄周生年分别为公元前369、前335、前308、前375年,卒年分别为公元前286、前275、前286、前295年。说法不一。)生活于战国时期。庄学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的一个重要学派。他的散文的文学成就超出同时代的散文,具有独特的风格。代表庄周思想及散文风格的《庄子》一书,对后世的哲学、文学影响深远。因其与老聃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有相通之处,一般合称为“老庄”,因其散文独特的艺术风格,人们又把他和屈原并举,称为“庄骚”。

关于庄周的一生,因现存的材料不多。只能根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战国时期某些著作的零星记载,以及散见于《庄子》的论断,大致可以勾勒出一个轮廓。

庄周,战国时宋之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与孟

轲同时而稍晚。在蒙曾做过漆园吏(职位很低的官吏),大约时间不久,就隐退山林,终身不仕。曾去过梁(在今河南)齐(在今山东东部),楚(长江中游)等地。他生活贫困,曾身居陋巷,靠打草鞋生活。《庄子·外物篇》说他“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山木篇》说他“衣大布而补之,正廩系履而过魏王”。他曾到过楚、齐,从他的文章所写的生活来看,大约一生似乎在他的家乡的时候多,可能是《刻意篇》所谓的“就藪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的一种隐逸之士。庄子虽生活贫困,但拒绝出仕。《列御寇》说,楚王使人往聘庄周,庄周不应。《史记》本传说: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入以太庙。当是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史记》把楚王写作楚威王,不知何据。这段话,很可能是从《秋水》、《列御寇》中两个相似的故事演化来的。《庄子》中有关庄子的事迹记述很多,因为多是寓言,无从判断哪些是真事。但我们从中仍然可以窥见庄子的学识、思想、性格、神态和精致。庄子才很高,学极博,思想无比精深,感情异常丰富。然而他毕生寂寞,门徒不多,朋友有限。当时学术界的名人中,只有惠施同他经常来往,经

常辩论。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只有荀卿提到他,说庄周的思想认识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庄周死后,汉初人讲黄老之术而不讲老庄,两汉时没有人注意庄学,没有人注《庄子》。到了魏晋间,玄学兴起,《庄子》受到极大的重视。崔譔、向秀、郭象、司马彪等纷纷注《庄子》。然而庄子的思想却遭受到曲解。其中以郭象的《庄子注》影响最大,而曲解最甚。庄子全然有别于儒学,而郭象的《庄子》注实际上是调和了儒学和庄学。魏晋以后,佛教盛行,高僧、居士以佛解庄,把庄周描绘成释迦的同调(见《世说新语·文学》)。隋唐之后,适应王朝统治的需要,《庄子》仍然受到各种歪曲。从另一角度看,未尝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魏晋之后,《庄子》引起各代文人的重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庄子》是庄周及其门徒、后学的著述总集。传世的《庄子》为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后人大多认为内篇是庄周所作。外篇、杂篇是庄周的门徒、后学之作。其实,传世的《庄子》是魏晋人郭象编定的。先秦的《庄子》究竟有多少篇已经不详。早于郭象数百年的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关于《庄子》的著录并无内、外、杂三篇的区分。《史记》本传说:

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数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箝》,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言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

免也。

司马迁不仅指出庄周“明老子之术”、“诋訾孔子之徒”这一基本思想倾向,而且明白点出他读到的《庄子》中的若干篇名。《渔父》、《盗跖》在世传的《庄子》中列于杂篇,《胠箠》纳入外篇。就世传本《庄子》来看,凡是“剝剥儒墨”、“明老子之术”的文章,多集中于外、杂篇。在这方面,今人任继愈已有详细的论述,这里不需要多谈了。

《庄子》一书,既反映出庄子的哲学思想,又表现出他的文学成就。不像某些思想家兼作家。因此读《庄子》的文章,无法把书中的这两部分截然分割。庄子的思想精深,表现的方式奇特,为了更好地理解其散文的文学特点,有必要扼要地分析其主要的哲学思想和人生观,前面说过,荀子认为“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这个评价抓住了庄子哲学思想的特点:凡是存在自然和社会对立的地方,他总是肯定自然,否定人为的社会、文化、道德。从他的社会历史观说,庄子肯定人的自然本性,认为仁、义、礼、智是强加在人的自然本性上的绳索;从他的自然观说,他抬高无形的“道”,“绝对”和“无限”的地位,贬低社会具体事物,“相对”和“有限”的地位。他把构成世界的原始材料称为“无”(无形),万物从这个无形的材料产生,有了物,就有了形体,这就是“有”。无,庄子又常把它说是“气”、“道”。万物变化取决于“道”,道的属性就是无为。任其自然,就是无为。从他的认识论方面说,认为“认识”依赖对认识对象的接触,还依赖于思考。由此出发,他认为世界是可知的。认识者与认识的对象虽非同类,也可

以认识。从庄子的人生观来说,他之所以甘受贫困,甘受寂寞,遗世独立,主要因为他不满于当时的封建等级宗法制的社会现实,厌恶虚伪的仁义礼智的封建道德规范,主张一切顺应自然,反对人为。春秋战国之际,在封建化过程中,各种矛盾冲突异常。当时的自耕农中有一些是没落的贵族后裔,他们有贵族的血统和文化教养,但土地有限,必须亲身参加劳动才可以维持温饱。这些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对现实绝望,对现行制度不满而成为弃世的隐者。《论语》中的长沮、桀溺、荷蓑丈人、楚狂接舆(《庄子》中也说到他),《庄子》中的庚桑楚,南荣越等都属于此类(庚桑楚等未必实有,也许是庄子虚拟的人物)。他们愤世疾俗,甚至认为社会发展,人类文明给他们带来了不幸;更因其经济、政治地位的软弱、低下,无力改变现实,因此产生无所作为和虚无主义思想。强调适己任性,放荡不羁,借以求得暂时的精神解放和安慰。我们无法知道庄子的出身,但从《庄子》中所表露的思想情绪、生活和人生观,无疑是这类人的思想代表。他憎恶和蔑视现实中的一切,要求“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求“无用之用”以避祸全身。他编织许多离奇的情节、描写一些可敬可恶的人物,以及虚幻的精神境界,都寄寓了庄子的思想、情绪。

庄子的哲学思想虽存有矛盾,但时有异常精辟的见解。庄子散文绝妙,千百年来被文人称道。屈原是荆楚文化的代表,庄子也颇受荆楚文化的影响。他们开创了以浪漫主义为主要倾向的“庄、骚”风格。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到庄子散文的特色:

(庄子)著书十数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脱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庄子散文的特点之一,就是文章中使用了大量的含义精微的寓言。他的许多思想观点多是靠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表达的。庄子本人也说:“寓言十九”(寓言篇)。寓言是从春秋战国时的辞令演化来的。寓言大多是一种借此喻彼,言近旨远、以小识大,以浅见深,托古讽今的小说式的故事,用以阐明大道理。先秦的历史散文如《吕氏春秋》、《战国策》等,诸子散文如《孟子》、《韩非子》等都有不少寓言,他们以寓言引人入胜,或驳难对方,或阐发自己的主张。而《庄子》运用得最多、最精,也最有传奇色彩。《庄子·寓言篇》说的“寓言”、“重言”、“卮言”,实际都是寓言。他的寓言为什么是文学?闻一多先生在1927年写的论文《庄子》中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关键在于“谐趣和想象”两点。并说,“若不是充满了他那隽永的谐趣、奇肆的想象”,庄子的寓言就和先秦其他的著述中的寓言没有区别。谐趣和想象结合,就形成《庄子》寓言的那种机趣横出、设想奇幻、寓意深切、充满了智慧的文字。这种文字可以说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不仅有启发性,能引起人的联想和思考,且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这就是《庄子》寓言之所以是文学的道理,以及其所以是庄子的独特艺术风格的道理。《庄子》中的寓言,或质朴或秀美,或大笔勾勒,或细致刻画,都随意之所至,如行云流水,自然而富有变化。如“触蛮之争”(《则阳篇》)和“浑沌

之死”(《应帝王篇》),语言质朴,只勾勒数笔见意。前者分别写建立在蜗牛两个触角上的触国和蛮国“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用以嘲讽当时诸侯为争夺地盘而相互残杀的可悲可笑。后者是根据神话写成这个寓言。神话见于《山海经·西山经》(《山海经》写成定本较晚,但它的故事长期在民间流传,故事应早于《庄子》):

有神鸟,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惟帝江也。

这本是志异的一段文字,并无深意。庄子随手拈来,舍弃原文对神鸟的外形的描述,只摘取“浑敦无面目”一点,以其奇幻的构想,设“倏”与“忽”两帝为报答“中央之帝浑沌”“待之其善”的这份情谊,仿照人有耳目等七窍为浑沌“美容”,“日凿一孔,而浑沌死”。文字古朴,直叙其事,而意趣横生。它精辟地体现出作者的重要思想——万物均应顺应自然,适其本性,否则,将受戕害而丧生。

《庄子》的有些文章或通过环境气氛的铺设,或通过人物思想行动的描写,或通过简短的对话,完整地表现其思想情绪。如《至乐篇》中写庄子之楚,途中见空髑髅的一段文字。这个空的头骨“髑然有形”,庄子“櫟之马捶”。并追寻其致死的原因。后,庄子“援髑髅而卧”。夜深,髑髅出现于梦中,双方有一段严肃的关于生与死的对话。文中对这一过程的描写较详,也较曲折,表现出庄子见髑髅后的种种思维活动和心态。关于生与死的讨论,逐层深入,文字厚实凝重,触动庄子进一步思考:髑髅把死的

乐趣与生之忧患，作了鲜明的对比，而生之忧患，其根本原因在于“有君、有臣”、“有四时之事”的约束和羁绊，恰恰没有精神上的自由。这段对话，展现出社会的苦难，人生的不幸。作者用髑髅的感受表现庄子的厌世思想和对超脱人世、获得精神解放的向往。消极厌世，本是庄子思想的消极方面，他所向往的绝对自由也是虚幻的。然而这段对话却使读者清楚地感受到庄子所处的时代的苦难，庄子所代表的阶层的失落感，以及理想幻灭的深沉的悲哀。《外物篇》的“儒以《诗》、《礼》发冢”一文，反映了作者对当时儒家宣传的仁义，《诗》、《礼》和社会恶习的鞭挞。大儒和小儒师徒干着掘墓盗物的勾当，却引经据典地把它说成是合乎《诗》、《礼》的行为。对此，作者作了细节的描写。大儒说：“东方作矣，事之若何？”表明他们是趁黑夜盗墓。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因天快亮了，不免心虚。小儒告诉大儒：“不解裙襦，口中有珠”。大儒立即诵《诗》，给小儒打气，并掩盖自己的丑行：“……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表示取死者口中珠是合理的。并教小儒怎样取出这“口中之珠”，叮嘱“无伤口中珠”。接着用“接其鬓，摩其颧，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一段细节描写。教小儒在死者的鬓、颧、颐、颊四个不同的地方，使用“接”、“摩”、“控”、“别”——即撮、按、敲打、撬开四种不同的手段取珠。不仅教给取尸体“口中珠”的特有的动作，还特地加上个“徐”字，以表示慎重，唯恐损伤了“口中珠”。这就给了读者极鲜明的印象，这个大儒俨然是个富有经验的贪婪的盗墓者，大儒就是这样进行言传身教的！在这段寓言中，作者没有直接说一句话，只是通过描写，

曲折委婉而又形象化地嘲讽了儒家言行的虚伪悖谬、可笑、可悲。这也就是司马迁在庄周本传里所说的：“善属辞，指事类情，用剝剥儒墨。……”《秋水篇》里有段“惠子相梁”的故事，辛辣地嘲讽了惠施。它以鸕雏与死抓住一只腐鼠的鸕臯相遇的一段描述表现出来。庄子以鸕雏自况。用鸕雏的“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喻自己的高洁，蔑视世俗醉心的名位；以鸕臯抢住腐鼠（喻梁国相位）不放的心态喻惠施思想境界之低下。文中把表白自己和嘲笑对方两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收到强烈的艺术对比的效果。《列御寇篇》里的“宋人有曹商者”，用两小段对话，淋漓尽致的挖苦了曹商，曹商得意忘形地夸耀自己本领的神情，庄子对曹商的极大蔑视，犹如一幅绝妙的讽刺漫画，有力地针砭庸俗、恶劣的社会风气。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庄子寓言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寓庄于谐。作者生动地运用诙谐、谑弄、嘲讽的语言，奇幻的构思，揭露世间的丑态和愚昧的行为。使读者获得鲜明深刻的印象，发人深思。庄子说：“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见《寓言篇》），但他的写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

令人心醉的是《庄子》中有许多优美的叙事、写景、抒情的文字。如《秋水篇》开头一段。先描写秋天黄河水涨，一片汪洋：“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表现出河水的宽广浩瀚。继而以河伯欣然自喜，顺流入海，见大海之烟波浩渺，始悟自己见闻的狭隘、浅薄，感叹宇宙间道

之难穷。《逍遥游》是一篇最能显示作者的思想和艺术风格的散文。它以描写神奇的大鲲、巨鹏开端。作者以惊人的想像力描绘大鹏腾空而起的壮观。“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怒而飞”，描摹大鹏怒张其羽翼，扇动着翅膀，奋起高飞的样子。“其翼若垂天之云”，表现大鹏凌空，像云行中天，遮天蔽日。作者并引用《齐谐》的话来补充、印证、加深已有的描写。“水击三千里，搏（旧说作“搏”形误）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大鹏经三千里的拍水滑行，后鼓翼拍击着海上飓风直达高九万里的上空。文字不多，而穷形尽态。高空是怎样的景象？作者用云气流动如野马奔腾，微尘浮动来形容，更联系人的经验说，大鹏在高空下望大地，犹如人的仰视高空一样，苍苍茫茫，不辨正色，表现天空的高远。整个段落，在形象的塑造，高空的描写，都带有神奇的色彩，但它又真实地描摹出物相。体现《庄子》文章的浪漫主义特色。从全文说，当读者对大鹏的壮举惊叹不已时，作者笔锋一转，引入作者企图说明的主要观点——绝对自由，超越时、空，各种条件限制的自由。像大鹏这样神奇的高空翱翔，仍然不能“无待”，需凭借海上飓风而后才可以腾空。这就不仅有力地说明作者的思想，也使文章起伏变化，波澜叠起。《外物篇》中写任国之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辖以为饵”垂钓于会稽东海之滨的故事：“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骛扬而奋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仅三十馀字，写出一番惊天动地的景象：扬其头尾，奋其鳞鬣，是大鱼吞钩后昂首张鳞，挣扎乱窜的情态；“白浪若山”以下四句，则以大海的陡然变幻，见海之深，鱼之大，

以及鱼的苦斗。文章腾挪变化,气象万千,又如《达生篇》中叙述一个驼背的人用长竿粘蝉的故事。文中着重描写他粘蝉的技术训练及所以获得成效的要领。用长竿粘蝉最忌手颤,手颤则竿头摇动。驼背人竿头置累瓦来锻炼臂力和技能。瓦逐渐增加,臂力、技能日益提高:“失者锱铢”、“失者十一”,“犹掇之也”。“若厥株构”、“若槁本之枝”,形容其驼背人身与臂持久处于沉稳静止的状态。最后说粘蝉时还要全神贯注,达于似有神通的境界。又如《齐物论篇》里有一段写风的奇文,可谓精微传神之作。“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连续使用比喻,从小的孔窍到大的洞穴,用人体的鼻、口等孔,圈、臼等深地、洼地大家熟知的物态,来比拟种种窍穴,用“激者、謫者”等八种不同的声音描摹风吹入窍而发出的音响。写风吹树动则“于”、“喁”之声相和。风有大小,和声则“冷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这段文字有声、有状、穷物理,达物情,穷尽造化的姿态。一般人写风只能写出风之表象,作者却写的是风的自身。把难以捉摸的东西表现得如此出色,颇得风之神理。文句错落有致,更增添了文章的风韵和气势。赵秉忠说庄子、列子“摘而能文,穷造化之姿态,极生灵之辽广,剖神圣之渺幽,探有无之隐蹟……”又说:“天籁之鸣,风水之运,吾靡得覃其奇矣。”(转引自《闻一多全集·古典新义》)确实对《庄子》文章深有的体会的评语。同样,庄子形容马:“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踈”(《马蹄篇》);写雉则:“泽雉一步一啄,百步一饮”(《人间世篇》);描写“庖丁解牛”,则具体描写宰牛时庖丁的手、足、

肩等的协调动作,描述其对宰牛规律的逐步掌握,最后达于神化的境地(《养生主篇》);描写“匠石运斤”,则“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垠而鼻不伤,郢人不失容”,极尽宾主之契合(《徐无鬼篇》);描绘残疾人支离疏之伛偻:“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人间世篇》)。如此种种,在《庄子》一书中,俯拾即是。作者把握住所描写对象的主要特征,不仅能够随物赋形,而且能独创新意,表现其精神。宋人朱熹说“是他见得方说到”(《见《朱子语录》卷一二五)。这句话似乎很平淡,意思却真切、丰实,大手笔能做到的也不多。“见得”,应包括作家独有的观察力、体会、识见和审美观,“说到”,就是“穷造化之姿态”。

《庄子》的文学价值不只在构思和文辞上,还要从它的思想、艺术的总体上去把握。庄子有悲观厌世、隐遁以远祸的思想,但这丝毫没有淡化他对社会变革、学术争论、宇宙、人生诸方面的关注。各种思想经常在他的心灵上引起震荡。他一方面认定现实全是虚无,如,认为人生不过是天地间的过客,从“无”——自然中来,匆匆又回归于“无”——自然。另一方面他以为真正虚无才是实有,执著地追求“至人”、“真人”的精神境界。他确乎一生寂寞,在寂寞中他探索精微的宇宙之道,人生之道,也在寂寞中编织自己的梦幻,以求得到精神上绝对自由的快慰。他有哲学家的冷静洞察宇宙万物的头脑,又有浪漫的、敏感的诗人的气质。这两者结合,相辅相成,构成他的散文特有的艺术风格,也使他的散文产生不同于常人的艺术